

青年人才发展

DOI:10.15998/j.cnki.issn2097-6763.2026.03.011

“循规的家伙们”：大学生“找代课”现象的行为逻辑研究



冯力凡^{1,2}, 张越¹

(1. 天津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天津 300387; 2. 青海民族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 西宁 810007)

摘要:近年来,高校内出现一种新的逃课现象——“找代课”,即大学生以替身在场的形式实现身心双重离场。该现象既区别于显性逃课的彻底离场,也不同于隐性逃课的形式在场,是独立于二者之外的“第三类逃课”。但既有研究多聚焦传统逃课类型,缺乏对“找代课”这一新型越轨行为的研究分析。基于田野调查,本研究发现找代课的大学生兼具两类群体的行为特征,他们既趋近保罗·威利斯笔下“反抗学校的家伙们”,又在与学校制度和权威抗争的过程中选择了维护合规的表象,塑造了“象征性循规”的“循规的家伙们”角色。从行为逻辑来看,社会变迁与认知冲突弱化了大学生对课堂价值的感知,师生人际关系疏离削弱了学生道德行为的外在约束,加之大学生身心发展阶段性特征对自主性的追求,共同形成了工具型、疏离型、自决型3种驱动力,这是大学生表现出“家伙们”越轨行为的主要原因;而出勤考核压力、管理制度漏洞、信息技术赋能与个体认知偏差,则使大学生得以通过找代课维系“象征性循规”的一面。调解这一现象,需在补全管理制度不足的基础上,思考如何重塑高校课堂教学的独特价值、强化高校学习共同体建设以及加强对学生的学业生涯规划指导。

关键词:大学生;逃课;找代课;象征性循规;高等教育;教育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76763(2026)03010612

一、问题提出

在教育社会学经典著作《学做工》中,保罗·威利斯以个体对学校制度的态度与行为表现为依据,将学生划分为“循规生”和“家伙们”两类异质性显著的群体。“循规生”遵循学校制度并认可官

修回日期:202510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高等教育赋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研究”(BIA250163)

作者简介:冯力凡,男,山西长治人,青海民族大学与天津师范大学联合培养硕士,主要从事教育人类学与教育社会学研究;
张越,女,甘肃秦安人,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人类学与教育社会学研究。

引用格式:冯力凡,张越.“循规的家伙们”:大学生“找代课”现象的行为逻辑研究[J].重庆高教研究,2026,14(3):106-117.

Citation format: Feng Lifan, Zhang Yue. Conformist lads: a study on the behavioral logic of undergraduates' "substitute attendance" phenomenon[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26, 14(3): 106-117.

方的时间表和意图^{[1]38}，“家伙们”则生产了“反学校文化”，通过逃课等背离制度规范的行为反抗学校权威，“整个学校经历成了他们最想逃离的对象”^{[1]101}。其新著《在中国寻觅现代性踪迹：以西方之眼看今日中国之现代性、传统与教育》中，威利斯又将中国学生分为了“走高考道路的人”和“不走高考路的人”，认为前者通过契合勤奋、遵循规则等学校主流文化，搭乘教育“快车”，以“迟到的文化现代性”为代价，换取未来成功的可能。而中国大学教育中的事实，与上述理论形成了鲜明矛盾：那些通过高考大门、理应作为“循规生”的大学生们，却因频频逃课引起广泛关注。

已有研究主要依据“身体是否在场”将大学生逃课分为显性逃课与隐性逃课两类。前者指学生无视学校纪律的旷课行为，学生身心均不在场^[2]；后者则强调一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精神旷课状态，学生身体在场，却做着各种无关当节课堂之事^[3]。依据逃课的动因，显性与隐性的逃课行为可细分成惰性或理性逃课^[2]。惰性逃课源于学生缺乏明确学习目标、自律意识淡薄以及易受同侪效应的影响^[4]，表现为直接脱离课堂而投身于玩游戏、睡懒觉等课外非学习活动，或是无意识地游离于当堂教学之外的虚拟空间^[5]；理性逃课则是学生“自主决定不参与”的选择^[6]，受实用主义心态驱动，对课堂价值产生怀疑，或对教师照本宣科教学方式不满的抵抗^[7]。

在现有分类框架之外，本研究关注到一种新型逃课——“找代课”，即部分大学生以网络社交与信息互助平台为主要渠道，通过“线上联络、线下代劳”的模式，雇用其他学生使用本人信息代为上课的逃课现象。从行为本质来看，不同于显性逃课的彻底离场与隐性逃课的形式在场，找代课是行为主体通过“替身在场”实现自己“身心皆不在场”并试图保全制度层面合规性的行动，是“形式合规”与“实质违规”的矛盾统一。作为一种特殊的逃课现象，其突破了传统的逃课划分逻辑，成为独立于显性与隐性逃课之外的“第三类逃课”。

作为一种新的逃课形式，目前学界对找代课现象的关注近乎空白，但其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亟待解答：如何看待这类通过高考进入高校，却时常游离于高等教育课堂体系之外的大学生，他们是“循规生”还是“家伙们”？这些大学生为什么不参与高校课堂？又为什么拒绝选择显性或隐性逃课，而是产生了找代课的新机制？基于此，本研究立足于学生主体视角，对找代课的大学生进行了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与非正式访谈在内的田野调查，拟揭示找代课大学生的角色特征、找代课现象的行为特征及生成逻辑，以期理解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时代挑战、助力高校更好履行人才培养职能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田野调查的实施

本研究于2025年3—7月开展了基于高校场域的田野调查。通过持续的田野工作，民族志研究者可以描摹出那些常被忽视的细节，进而理解一个群体的行为逻辑、情感模式等文化表现^[8]。首先，研究者通过线上、线下的参与式观察，掌握了找代课的基本情况。

大学生找代课的主要渠道涵盖QQ群、微信群等即时通信群聊，高校学生搭建的“表白墙”等虚拟社区，以及软件服务商面向高校学生开发的微信小程序等网络社交平台。以某小程序为例，学生可通过发帖形式发布找代课信息，内容通常包括“时间、课程名称、对接代课学生性别要求以及具体的代课需求”，例如“明早12节早八，男生，要全程在，记下老师划的重点”（田野笔记20250324）。接代课的学生会留言告知价格及个人联系方式，找代课的学生根据自身对价格的接受能力选择与对方做进一步沟通。在确认交易后，找代课的学生会向对方提供本人的姓名、学号、考勤软件账号等详细信息，并告知其需注意的课堂细节，如老师的考勤偏好、提问偏好等。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学生的需求差异，找代课还可以细分为“代签”与“代课”两类。前者价格较低，接代课的学生仅需完成课堂考勤，考勤完成后可借去卫生间的名义或趁课间休息离开课堂；后者价格更高，接代课的学生需全程留在课

堂,除应对考勤,还需参与小组讨论、回应教师提问、完成当堂作业等课堂活动。此外,从更广义范畴来看,找代课现象并不局限于课堂,还广泛存在于学校强制学生参与的各类校园活动之中,例如讲座“代听”、校园跑“代跑”等。

(二)访谈及其样本

代课实践中的各方主体并不处于同一时空,仅凭参与式观察难以掌握找代课学生的深层行为逻辑,还需以访谈法弥补这一不足,搜集更全面且有深度的研究资料。由于找代课本质是高校中敏感、灰色的越轨行为,获取足够且真实的研究材料面临较大挑战。因此,研究者选择通过主动的参与式互动来寻找访谈对象;同时,来自群体内成员的介绍是进入一个群体的最佳门票^{[9]41},研究者亦借助相互推介的滚雪球抽样法,逐步扩大访谈对象范围。经过长期的互动交往,访谈对象与研究者逐步建立起熟悉与信任,愿意袒露内心真实想法,保障了后续访谈的真实性。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向部分建立起稳定联系的大学生表明研究意图,并发出正式访谈邀请,最终有8位大学生接受访谈(见表1)。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允许访谈对象根据自己的交流偏好选择线上或线下形式;对线上访谈,采用“语音通话”的沟通方式,以兼顾访谈的有效性与隐私性。为确保材料全面性,研究者先对序号1-6的学生进行深度访谈,搜集到丰富的原始材料;经整理分析后,再对序号7-8的学生开展深度访谈,未得到新的其他信息,说明所获材料已达到饱和。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序号	编号	性别	年级	学科专业
1	GW-wyf	女	大一	绘画(水彩)
2	GW-hjq	女	大一	思想政治教育
3	GM-hxc	男	大一	马克思主义原理
4	GW-yhl	女	大一	环境设计
5	GM-hyxy	男	大二	教育学
6	GM-djh	男	大二	人工智能
7	GM-ztb	男	大三	国际经济与贸易
8	GM-cbt	男	大四	朝鲜语

三、找代课学生的行为逻辑分析

在威利斯的研究中,“循规生”(conformists)意为尊奉者、墨守成规的人^[10]。尽管威利斯后来认识到循规生对教育“可能有着自身更为工具性的洞察”^{[1]266},但在成书时,其对该群体实际持一种符号化的认知,将循规生等同于“书呆子”“软耳朵”,认为他们只知被动、机械地服从规则,不知反抗^[11];且在关注重心上,由于循规生仅作为威利斯笔下主角“家伙们”的陪衬,他们的循规实践仅得到了被动的展示。针对威利斯过去研究中“长期忽略了另一组少年(循规生)……这组少年经常被误解”^[12]的遗憾,国内学者论证了循规生存在意义层面的主动循规,关注到循规生的能动力量与创造性,认为他们并非只是“被动机械服从”,而是对循规持有内在信念,甚至是真正具备洞察与破坏社会结构的力量^[13]。这些研究既弥补了威利斯的缺憾,也为理解学生循规提供了更加立体的视角。

本研究则关注到一类被既有研究所忽视的“从事越轨行为的循规生”,发现这一群体呈现出异于上述分野的循规表现,即他们会主动表现出形式上迎合学校要求的行为,实质却未真正认同、落实其教育目标。基于找代课现象的田野调查,本研究将这种“主动的实质背离”概括为“象征性循规”。这种独特循规有着学理层面的支撑。例如,迈耶和罗温基于组织合法性的研究提出“仪式性顺从”策略,

表现为组织为获取外部认可会表面遵守制度规范,实际却仍遵循其内部逻辑^[14];威利斯近来关于校园循规者文化生产的观点也指出,循规者可能存在“知行不合一”的情况,即“行为上遵循学校文化和规范,但认知上对其冷眼旁观、充满质疑”^[15],这为理解形式合规却实质违规的“象征性循规”提供了依据。

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这些通过高考竞争的大学生本就体现着认同教育价值等契合学校文化的循规生特质。他们并无“反学校文化”的天然倾向,却以越轨行为逃离课堂,实际呈现向“家伙们”趋近的态势;另一方面,他们以找代课作为具体的越轨形式,既以“替身在场”顺应学校制度,又以“身心离场”实质背离规范。通过文化生产,个体会拒绝、洗牌甚至重塑传统价值观对其进行的分类和所贴的标签^[15],这一群体的行为选择虽具主动性,却并非“读书的料”等经典教育社会学研究所呈现出的、循规生所展现的那种积极正向的实践风尚,因而既无法用威利斯的“被动机械循规”解释,又与后继的“主动实质循规”相去甚远。由此,厘清其课堂越轨、向“家伙们”趋近的动因,以及选择找代课作为具体越轨形式以表现“象征性循规”的缘故,对解析其角色特征、越轨行为与生成机制至关重要。

(一)何以趋近“家伙们”

1. 工具型趋近:社会变迁与认知冲突弱化对课堂价值的感知

社会心态是特定时期社会成员普遍的心境状态,部分大学生课堂越轨、向着“家伙们”趋近的底层逻辑,首先植根于经济社会急剧变迁之下,个体对未来的焦虑感与不确定性。

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而高校毕业人数逐年递增,大学生就业面临学历贬值与人才市场拥挤的叠加压力,“毕业即失业”的社会论调与“书中自有千钟粟”的传统认知形成强烈冲突,使得一部分通过高考独木桥的大学生滋生出负面社会心态,进而参与到机会竞争的内卷浪潮。“现在竞争真的太激烈了,其实我不是很想考研,但我觉得如果不考研,好像更没有办法去跟别人竞争了。”(GW-wyf)除了升学内卷,部分学生还呈现出就业内卷的趋势,倾向于集中时间精力寻求提升就业竞争力。“(找代课省下时间学报的建模课,辛苦吗?)对就业有用就值得,没办法,就业前景不好,只能早点扩展自己的能力,让自己的‘翅膀’硬起来。”(GW-yhl)可见,不同于惰性逃课的表现,本文研究群体通过越轨压缩课堂内的时间,并不指向课堂外的消极堕落;而在认知层面,他们也未否定教育价值,反而表现出对教育赋能自身发展的明确认同。“我觉得,读书会让我更好,这条路适合我。”(GW-hjq)从行为原因来看,时间冲突是部分学生课堂越轨的直接诱因。“这学期找代课是因为报了一个考研集训班,在校外十几公里的地方,我不方便来回跑。”(GM-ztb)这类客观条件层面的回答看似合理,却引起我们的追问:无论有教育者教导或是自我教育都是教育^[16],高校的课程安排与学生的自我规划在育人目标上并不存在矛盾,可受访学生为什么不再将重点放在课堂内的课程学习,而是要以越轨作为手段将发展希望寄托于课堂外的规划上呢?

有学者发现,逃课多发生在学期后半段——经过一段时间的听课,学生发现课程对自身助益有限,于是选择逃课^[17]。在本研究中,受访学生几乎没有自课程开设伊始就找代课的情况,找代课通常是他们对部分课程失望后的理性选择。“我差不多是到学期中才开始找代课,之前去上了几节,感觉没什么用,实在是待不住了,才找代课。”(GM-cbt)从他们对课堂的评价中,我们得以窥探这种失望的具体表现,“就业并不是一两节课就能说明白的东西,如果学校真的希望对同学们的就业有帮助,就不可能一学期只安排两节就业指导课。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敷衍,我对它的存在意义都是存疑的,这门课应该开设吗?”(GM-cbt)

不难看出,时间上的冲突只是越轨行为的表层诱因,其深层逻辑在于社会变迁之下,高校课程供给与学生升学就业现实需求的错位。当学生感知到这种错位,便形成了对部分课堂价值与意义的弱感知。在这种认知下,学生倾向于在课堂外寻求适配社会实际的发展路径,而课堂越轨便成为他们在衡量学习成本与收获、未来压力与现实紧迫后做出的理性选择。

2. 疏离型趋近:师生人际关系疏离削弱道德行为的外在约束

人际关系是影响个体责任感的关键因素^[18],人际关系越好的人,越会表现出对他人承担责任的意识与行为^[19]。大学生向着“家伙们”角色靠拢,与师生间基于课堂场景构建起的人际关系逐渐疏离、淡漠紧密相关。

在访谈中,受访学生普遍提及基础教育阶段与高等教育阶段教师角色的鲜明差异。“初、高中的老师更像是‘大家长’,除了教学以外还有很多职责,比如监督你的言谈举止。”(GM-djh)在基础教育阶段,教师除了知识传授,还需引导、监管学生的日常行为,师生关系较为紧密。但踏入大学校门后,学生明显感受到这层关系的转变。“作为学生,我能感觉到和高中时候的老师更熟悉一些,和大学老师感觉很陌生,而且我们之间的距离正变得越来越遥远。”(GM-ztb)

从成因来看,当前高校普遍以学术成果作为考核教师的主要指标^[20],科研在教师考核评聘环节扮演着比教学更重要的角色^[21],教师的工作重心逐渐从“三尺讲台”转移至“科研实验室”,精力也更倾向于能助力科研的研究生,形成“研究生优先于本科生”的态度倾向。在这种科研导向的整体氛围中,受访的本科生群体常感到被忽视。“人家是教授、副教授,手里课题一个接一个,手底下一大堆硕士、博士,和我有什么关系呢?”(GM-hxc)而在具体的教学场景当中,高校弹性工作制下缺乏固定课外互动时段的特点,使得“上课卡点来”“下课准时走”成为受访学生最为熟悉的教师行动策略。“大学的老师跟初高中的老师不是一个概念了,大学老师就是上班嘛,只想着快点上课,上完就走人了,根本懒得处理学生间的矛盾,学生间的摩擦跟他有什么关系呢?”(GM-djh)师生见面的场景几乎完全被压缩在匆忙短暂的课堂,而仅有的互动也多围绕知识传递展开,少有深层次的思想沟通与行为引导。此外,高校内普遍存在的大班培养、大班授课模式更是放大了课堂场景中的互动匮乏。“以前老师可能会提拔你、关注你、对你好,但是大学的话,学生太多了,老师都不知道我是谁,更谈不上对我有过什么帮助。”(GW-wyf)大班额导致教师难以给予个体学生充分关注,学生“被忽视”的对比感进一步拉开了与教师的心理距离。

就这样,师生依托课堂及日常学业生活构建起的关系纽带逐渐松动,彼此本应有的熟悉感、亲近感等情感联结持续淡化,既导致学生遵守课堂纪律的责任感减轻,还显著弱化了学生从事越轨行为所需承受的道德约束力。“(你觉得找代课是对老师的欺骗吗?)大学老师也不像初高中那样管你,所以老师也不在意你,你也不在意老师,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不存在对老师的欺骗吧?如果是在高中做错事,我肯定会愧疚的,会觉得对不起负责的老师。”(GW-hjq)

3. 自决型趋近:身心发展阶段对自主性的追求强化越轨行为

大学生向“家伙们”趋近的底层动因,还包含基于个体身心发展阶段性特征而产生的自主性需求。在身心认知方面,受访学生普遍反映出对自身“成年与否”的矛盾认识。“小事我都会自己决定,大事还是更习惯求助父母,我是成年人不假,但他们是‘高级成年人’。”(GW-yhl)这一状态反映出大学生正处于青少年和成年之间的“始成年期”,即生理上达到成人标准而心理社会化尚未完成,但已开始尝试通过更多自由独立的个性追求和行为选择,探索自我以及与周遭世界的关系以形成更为复杂的自我认同^[22]。正是在此过程中,他们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外部安排,而是表现出对“自主掌控”的迫切需求,渴望自主决策。值得注意的是,与带有更多盲目、冲动色彩的逃课类型不同,本文研究群体的行为表现具有清晰的内在依据,更鲜明地体现出是基于自身需求的理性自决。“我觉得人得活得自洽一点儿,就是不要被整个环境所影响。找代课完全是按照个人需求来的,别人怎么样不会对我有什么影响,我想找那就找了。”(GMHyxy)

这种自决心理,首先体现在对“时间支配权”的主动追求上。如受访学生所言,以找代课实现课堂越轨让他们真切获得了自主安排时间的自由。“找代课能帮我节省出更多空闲时间,减轻我的压

力。此外,它还有一些隐性的帮助,比如有了更多闲暇时间后,我能为我的未来规划留出更多思考的时间和空间。”(GW-wyf)“给我的感觉是,我不用像高中那样为了上课把其他事情都推掉,而是多了一种选择,能应对在时间上的冲突去做别的事情。让我觉得人不用太死板,可以更灵活一点。”(GW-hjq)

学生以越轨换取自由与灵活的做法,本质是对学校官方制度时间的主动调适,就像威利斯笔下的“家伙们”那样,“对时间的掌控,是他们想标榜为直接认同和自我导向的一部分的东西”^{[1]38}。课程表、作息时间表等学校制度时间,蕴含着权力控制、规训与管束的属性,是学校教育活动的指挥棒;而嵌入其中的活动主体——学生,他们的自我时间安排往往受到控制^[23]。“早八”引发的高价代课现象便是从侧面对这种控制主动调适的具象体现。“早八需早起,起不来的人愿意多花钱找代课,接代课的人也因为额外的付出(定闹钟早起、买早饭)认为高价是合理的补偿。”(田野笔记 20250517)当学校固定的时间安排与学生自主的时间规划相冲突时,课堂越轨不仅成为他们确保其自成一套的时间模式得以持续运转的适配手段,更使他们切实获得“支配时间”的体验,强化了他们的自主意识。

除了时间,学生对自决的追求还延伸至“空间选择”层面。相较于课堂上“形在而神不在”的隐性逃课生,找代课学生更鲜明地表现出威利斯笔下“家伙们”的特质。他们会将离开课堂与摆脱空间束缚关联起来。在他们看来,勉强待在令自己失望的课堂是一种委曲求全的妥协,而他们不愿妥协。“真感觉被圈住了,因为做的不是我喜欢的事。大家都知道有很多水课,我坐在那有过这样的念头:学音乐的同学周末能教乐器,理工科同学泡在实验室做课题,游戏打得好的同学也能接单赚钱。而我呢?啥也没干,只能干坐在这糟心的水课教室里,觉得自己纯是废物,没做啥有意义的事,我不喜欢这种煎熬的感觉。”(GM-djh)

这种“被圈住”的压抑感,实际是学校空间规训与个体自主需求的冲突表现。学校通过明文禁止旷课、考察课堂出勤率等方式,试图以对空间的规范来维持秩序并对学生进行规训,确保学生的行为与学校的管理要求保持一致^[24]。对学生而言,这种规训抑制了他们自主决定“在哪里做什么”的渴望。此时,找代课作为一种越轨行为,成为他们保留空间机动性、捍卫自主权的重要途径。

(二)何以表现“象征性循规”

1. 具象现实压力:刚性出勤约束直接诱发找代课动机

部分大学生选择以找代课维系“象征性循规”,现实根源在于高校课堂出勤的刚性考核与学生在工具型、疏离型和自决型等驱动力下产生的课堂离场需求间的矛盾。

当前,高校普遍采用“平时成绩+期末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体系考核学生的课程学习。其中,平时成绩一般涵盖“课堂出勤”“当堂表现”“课后作业”等内容,其分值占比一般虽低于期末考试成绩,但在学生的实际感知中,该评价体系的权重明显向平时成绩中的“课堂出勤”倾斜。原因在于,教师普遍会以“扣平时分”作为约束学生课堂出勤的手段,出勤与否成为平时成绩其他分值评定的前提,存在学生“出勤即得分,缺勤则失分”的刚性关联,这催生了学生对缺勤的现实担忧。更严重的是,超出规定次数的缺勤还会影响期末考试资格,进而使学生面临挂科、重修的风险。“因为平时分的原因,我不想期末挂科,一旦挂科会很麻烦。”(GM-ztb)

在多重风险与约束下,课堂出勤成为学生不可忽视的行为红线,构成受访学生选择找代课的直接诱因。对他们而言,严格遵守高校的课堂在场要求会损害个人意愿,但如果直接违反课堂规范同样会给自身带来负面影响。在这种两难困境下,“替身在场”的找代课行为便成为此类循规的实践载体。“我觉得等到大三考研前的那个学期,得找老师商量一下不去上课,但后来意识到这可能行不通,老师应该还有课堂考勤率的要求,那到时候我应该还是会选择找代课吧。”(GM-djh)通过找代课,学生避免了显性逃课可能带来的损失与惩罚,实现规则与意愿的平衡。

2. 外部制度环境:管理漏洞滋生找代课行为的存续土壤

课堂出勤管理条例更新滞后以及请假制度的烦琐与矛盾,让学生感到找代课“能做”并“值得做”,共同为找代课提供了制度层面的存续土壤。

一方面,高校课堂出勤管理条例未跟上学生逃课行为的变化节奏,对找代课这一新型逃课缺乏回应,存在制度疏漏。关键事件是田野工作者可以用来分析整体文化的事件^{[9]106},田野学校在调查期间的一次学风治理专项工作,恰好印证了这一点。“教务处和学生处两部门人员将每天巡查教学楼,重点检查学生出勤率(包括迟到、早退)、前排就座率……如发现以上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将对相关授课教师及所在学院通报批评。请各位同学积极配合,遵守课堂纪律。”(田野笔记 20250420)管理部门的重点仍在应对传统逃课,关注上课的学生够不够、坐在前排的人多不多等外显指标的达成情况,追求课堂表面的“人头攒动”。涂尔干指出,“为纪律赋予权威的,不是惩罚;防止纪律丧失权威的,却是惩罚。如果允许违规行为不受惩罚,那么纪律的权威就会为违规行为所侵蚀”^[25]。高校未及时更新“找代课”相关的制度界定与惩处办法,这为学生“钻空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可以找代课呀,法无禁止即可为。之前我都无所谓,不想去就直接逃课。但这学期听说逃课会给人挂科,有点害怕,想着还是找个代课稳妥。”(GMHxc)

另一方面,请假制度的烦琐与矛盾压缩了学生通过正规渠道离场的可能。不同于过往研究认为青少年越轨是基于厌恶、愤怒的实践^[26],逃课是一种宣泄式回应^[6],找代课则更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意味。请假制度的初衷本是平衡学生离场需求与学校正常教学秩序之间的矛盾,为学生提供合理退场的路径,但实际上却成为“费力不讨好”的麻烦。一方面,学生常面临“批假难”的问题。“有些老师比较‘日眼’(西北方言,表讨厌),可能不让请假,但你有的时候确实来不了,这时候找代课会比请假简单。”(GW-hjq)即便能获得批准,也往往要经过线下到处跑腿的烦琐流程。“我高中请假都不需要假条,来了大学请假竟然要假条,还要盖章,明明我们都长这么大了。”(GM-cbt)另一方面,即使学生恪守流程实现了合规离场,但请假仍与逃课一样被认定为缺勤并扣除相应的平时成绩,矛盾式的后果使请假对学生而言就失去了实际意义。“逃课和请假都是一样的扣平时分,请假还得找辅导员和任课老师同时签字,又麻烦,分也没保住,我是吃饱了撑的才想去请假。”(GM-hyxy)当学生产生离开课堂的意愿,却因请假制度缺陷而面临合规离场成本过高的困境时,这种意愿与现实间的紧张关系使找代课成为他们绕开制度的突破口。

3. 信息技术赋能:网络平台推动找代课行为的隐蔽化

当下,移动互联网与数字技术已深度渗透高校场域,课堂考勤环节已普遍使用学习通、微信等网络平台,这些平台从“隐蔽签到”“隐蔽交易”两个维度消解了传统考勤的身份核验约束,重构了代课行为的供需匹配模式,为找代课行为搭建起低风险、低成本的隐蔽操作空间。

一方面,数字网络平台推动代课行为从“当面互动”转向“去人性化”。代课本身并非新鲜话题,传统课堂考勤中“帮同学签到”等行为早已有之,但过去考勤以师生间“点名一应答”的面对面核验为核心,教师可通过辨别声音、抬头识别等言语与非言语的互动,对代课行为形成天然的身份核验约束;而数字化考勤则从技术层面消解了这层约束。在学生的实际体验中,扫码签到、卫星定位签到等“去人性化”的考勤手段,让考勤无需与教师产生线下互动,仅需登录考勤软件账号即可完成操作,甚至可以在教室外进行,这显著降低了代课的操作门槛。研究者的蹲点观察捕捉到了这一典型场景。“上课铃响后,在教室门外老师看不见的位置,几位同学迟迟不进教室,而是低头盯着手机,似乎在等待什么……待老师要求学生打开学习通软件签到后,教室外的这几位同学立刻加快手指动作,在手机屏幕上接连点触。询问后得知,他们是在刷新消息,等着签到。”(田野笔记 20250317)

另一方面,数字网络平台推动代课行为从“熟人间的偶发行为”转向“匿名群体间的规模化交

易”。有别于显性或隐性逃课多是个体化的单独行为,代课更具复杂性,涉及多方主体间的互动,而彼时的代课行为又多局限于同学、舍友等熟人小圈子,这意味着学生需面临“人情债”“声誉风险”等社会关系的约束。在一次非正式访谈中,有学生表示:“找身边人签到会欠人情,下次可能要我,不如直接用金钱交易痛快……我还想评奖学金,所以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自己没去上课,怕被告状。”(田野笔记 20250630)网络平台的流行则化解了上述顾虑,以有偿雇佣为手段,代课主体构建起“找代课学生—网络平台—接代课学生”的互动链条。这一模式不仅将过去的“人情交换”变为“金钱交易”,规避了人情往来的隐性成本,更通过匿名沟通机制最大程度地降低了个体越轨行为泄露和被告发的风险。

4. 个体认知偏差:形式化的权威意识奠定心理正当性

“师道尊严”是中华民族积淀千年的教育文化精髓,却在找代课学生的认知中呈现出独特的实践样态,他们既将教师视为需规避冲突的绝对权威,又将对教师职业价值的认同窄化为维护表面的课堂秩序,这种认知偏差为他们找代课奠定了心理正当性。

一方面,“师道尊严”本源之意是“师严道尊”,强调通过“尊师”凸显教师作为“化民成俗”关键媒介的社会地位,进而彰显更重要的“道”之尊严^[27],即尊师是手段,重道才是目的。但“尊师”的意涵往往被曲解为维护“教师权威不可触犯”的等级秩序,成为带有等级化、专制化的人际关系符号^[28]。这种误解长期存在于受访学生的成长中,使其将教师视为必须敬畏的绝对权威,并催生出面对教师时的畏难情绪。“高中的时候是军事化管理,对学生压迫很大,有很多不合理的规定,但你必须遵从,学校不允许你有自我意识。慢慢地,我觉得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每个人都在最大化地行使他的权力,说白了就是一级压一级的感觉。”(GW-wyf)于是,找代课成为他们维持与教师无冲突状态的一种选择。“如果不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我是不会找辅导员请假的。他比较麻烦,很可能在开会的时候‘阴阳’(网络用语,表暗讽)你。”(GW-wyf)同时,这也是他们的“印象管理”策略,旨在避免招致负面评价,维护自身在教师面前的前台形象。“直接逃课怕被老师逮着,请假的话,老师会知道你没来,都会影响你在老师心目中的形象。”(GW-hjq)

另一方面,“师道尊严”的另一重意涵在于关注教师的根本价值信念与职业价值使命^[27],对学生而言,这指向对教师的教育教学价值、专业付出的内在认可,核心是通过主动参与课堂、践行学习责任,回应这种付出。但找代课学生对这种认同的理解是形式化的,他们将对教师的尊重窄化为维持课堂教学秩序的表面稳定。“尊重是这样一种感觉,如果老师在上课,那我在讲台底下不说闲话,这就算是尊重。找代课本质上也是这样,我人没来,但我找了代课,我把表面做好,不让老师觉得尴尬,我觉得这就是尊重。”(GM-cbt)此外,这种形式化认知还会通过自我合理化机制持续强化,最终固化为稳定的行为模式。如同威利斯所说,“循规主义并非外部赋予的,而是内心有一股激烈的火焰,一种对荣誉与自我合法性的确认和追求,尽管是在一个严格的、墨守成规的框架里”^[29]。与传统逃课不同,找代课并非单纯是学生与教师、课堂乃至学校间的纵向对抗,其决策还伴随着与其他逃课类型做横向对比。“找代课说明还有点害怕,直接逃了是怕都不怕了。我要是老师,面对一个逃课的学生和一个找代课的学生,如果期末的时候他们都是平时分差一点就及格,而我只能救一个,我会救找代课的学生。”(GW-hjq)通过矮化其他逃课类型,找代课学生构建出一条独特的“逃课鄙视链”。“对直接翘课不来的人,我对他们有一种优越感,看着他们的所作所为能让我更有种心理上的满足感。”(GM-djh)这一链条既为他们带来积极的情绪体验,又巩固了他们对自身行为具有正当性、合理性的心理认知。

总而言之,受访学生对教师“社会角色”与“为师之道”的片面认知,催生其以找代课表现“象征性循规”,既作为规避与教师权威冲突的策略性回应,又避免显性逃课对课堂秩序的公开冲击、维持教

师对课堂秩序完整的感知,并通过自我合理化机制实现心理自治。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从学生主体性视角切入,聚焦作为“第三类逃课”的找代课现象,探析其行为主体的角色呈现、行为特征以及生成逻辑,力图通过描摹这一被隐蔽的事实及学生心理的细枝末节,为该现象提供一种解释性的理解。研究发现,找代课的学生无法简单归属于“循规生”或“家伙们”的二分框架,而是兼具两类群体行为特征的过渡性群体。一方面,他们由于课堂越轨,在事实上站在了学校制度与权威的对立面,趋近“家伙们”的角色特征;另一方面,他们以找代课的方式表现“象征性循规”,在与学校制度和权威抗争的过程中维护了合规的表象,进而塑造出介于两类群体之间的“循规的家伙们”角色。这一群体呈现出鲜明的矛盾属性:他们因同时具有离开课堂的意愿和实际行为,要比消极抵抗的隐性逃课生更像“家伙们”;又因以“象征性循规”表现出对制度秩序的形式性顺从,而比真正洒脱的显性逃课生多几分克制,找代课深刻体现出他们在两相矛盾下的挣扎。

而对该群体行为逻辑的分析表明,找代课并非个体孤立的越轨行为,而是社会变迁的压力传导、人际关系疏离、技术工具更迭、制度环境滞后等社会宏观、学校中观层面的因素与大学生身心发展阶段性特征、个体认知偏差等多维度张力共同作用的产物。一方面,社会转型与变迁带来的认知冲突弱化了学生对课堂价值的感知,师生人际关系疏离造成彼此情感联结淡化,进而削弱了对学生道德行为的约束,而大学生追求自主性的身心发展阶段性特征促使其反抗教育中的时空规训,三者分别构成了解释本文研究群体何以趋近“家伙们”及其越轨意愿的工具型、疏离型和自决型动因;另一方面,规避刚性课堂出勤考核的惩罚是学生选择找代课的直接决策依据,管理制度的漏洞影响学生对代课行为的后果做出理性权衡,网络平台与数字化考勤为找代课构筑了隐蔽空间,而对教师权威的回避与形式化维护则奠定了个体找代课行为的心理正当性,四者分别从现实层面、制度层面、技术层面和认知层面,构成了本文研究群体维系“象征性循规”及其选择找代课作为课堂越轨具体形式的依据(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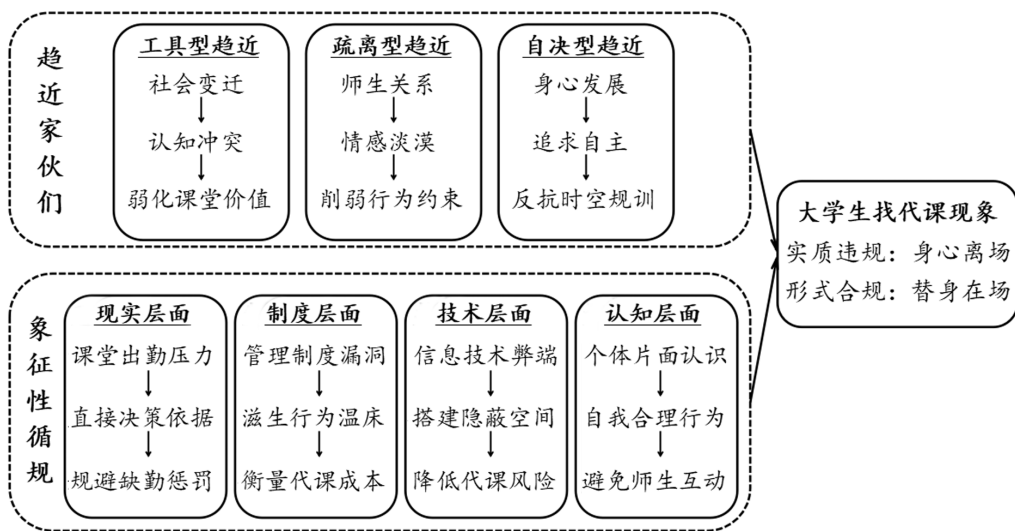


图1 大学生找代课现象的行为生成路径

通过揭示大学生找代课现象的生成逻辑,本研究认为,该现象并非单纯的道德问题,而是个人、学校与社会多层次交织的结构性难题,需正视其背后的深层矛盾。一方面,部分大学生对课堂价值、师生关系以及个体自主性的感知,是一种带有局限性的“部分洞察”^{[1]152},他们忽视了课堂教学的系

统性以及师生关系的复杂性,对自主的追求也反映出所属成长阶段的不稳定性。但从学生反馈来看,部分课堂确实与学生的需求脱节;教师难以平衡科研与教学的矛盾,继而引发“精力分散—情感疏离—学生离堂”的连锁反应;高校过度强调课堂教学时间标准化核算,导致学生陷入“自主探索时间贫困”^[30]。深究其源,学生的功利心态,与社会结构剧变引发的竞争漩涡、时间焦虑和不确定性^[31]直接相关;教师工作重心转移则受量化绩效评价标准^[32]的掣肘;高校重“课堂内”时间而轻“课堂外”时间^[33],实际是效率优先社会原则传导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们表现“象征性循规”,识别、利用制度中的空白与灰色地带,体现投机钻营与规避权威的倾向;对网络平台的不当使用则反映出数字伦理素养的欠缺;对师道尊严的误读凸显内化于己的错误认知。但这也反映了高校管理逻辑与学生需求错位,暴露出高校教育治理的滞后与对学生数字伦理教育的不足,未能帮助学生对教师形成正确的角色认识。从更深层次来看,刚性社会规则体系催生了个体为寻求发展弹性而规避规则的行为逻辑;社会弱化教育的人文价值、功利化定位教师职业,消解了学生对教师职业角色认识的文化根基;而当前社会对各种非正式网络平台野蛮生长的监管不足,既弱化了高校数字伦理教育的外部支撑,也加剧了学生平台使用的失范。

作为区别于传统显性与隐性逃课的“第三类逃课”,找代课具有更深层的危害,即蒙蔽了教育管理者对学生越轨行为的感知。斯科特在研究无权群体用以反抗的日常武器时指出,任何形式的反抗,其目的都在于减少或拒绝来自上层阶级的索要或者提出自己的要求^[34]。在高校场域,无论公开的显性逃课,抑或半公开的隐性逃课,均会不同程度传递出行为主体的诉求与不满,继而留下可追踪的改进线索;而找代课行为的主体则会刻意隐藏其越轨痕迹,既无意引发关注,更谈不上想推动问题解决。就像“大张旗鼓地离开都是试探……真正要离开的人,关门声最轻”^[35],这种“没有告别的离开”折射出部分大学生对高校课程、制度、教师等更深层次的失望。这种不公开的“沉默反叛”,对高校教育管理改革行稳致远的潜在消极影响要比传统逃课更为严重。

(二)对策建议

鉴于这一现象的特殊性及其成因的复杂性,不宜照搬传统逃课的应对思路,而需探索新的治理之道。

首先,刚性制度约束是基础。如康德所言,使个体考虑从惩罚中得到什么教训,该个体首先“必须被发现是有罪的和可能受到惩罚的”^[36]。高校应及时更新规章制度,主动回应学生越轨行为的演变趋势,明确找代课行为的违规属性及相应后果,消除学生的侥幸心理。还需认识到,给合理的课堂退出机制增设障碍,本质上会间接抑制学生进入课堂的积极性,因此应同步调整制度保障,简化请假流程,推广电子请假,取消“请假也扣分”的不合理规定,改变“请假比代课更麻烦”的不合理现状,让制度功效真正贴合制度设计的初衷。

其次,问题解决的关键并非以刚性制度将学生“捆绑”在课堂,而要重塑高校课堂教学的独特价值。“教育面对的是有生命力的人类主体,真正的教育总是存在着风险与弱点,只有对此积极接受,才能把握住教育的要领”^[37],相较于一味地管控,更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是如何以开放性、前瞻性的视野,让学生真正建立起对教师、同辈、课堂及学校的深度认同与归属感,从而引导学生主动重返并持续留在课堂。譬如,高校应结合学生评教、就业追踪及行业调研数据,裁撤陈旧课程,改造提升传统潜力课程,同时开设新兴课程、布局未来课程,使课程体系契合社会发展趋势、匹配学生的成长需求。至于教学革新,应突破教师的单方面灌输,推行小班化教学,强化互动研讨,引导学生主动思辨并及时回应疑问;地方院校需凸显案例的地域适配性与实践实用性,让课堂内容深度契合学生生活与就业需求,以参与感、获得感彰显课堂教学的不可替代性。

再次,强化高校学习共同体建设,加强对学生的学业生涯规划指导,引导其树立正确认知。高校

应秉持“以人为本”理念,尝试以本科学年论文为纽带,增加大学生可参与的教科研项目,并通过学术沙龙、师生座谈会等常态化交流活动,丰富师生互动的场景,构建起师生互动良好的共同体生态,继而消除彼此的陌生感,重新建立起真诚的情感联结。部分学生受功利化心态、焦虑迷茫情绪影响而对课堂价值持片面看法,高校应及时纠正这种认知偏差,助力学生树立正确课堂观,理解课堂教学在知识积累、思维训练与综合素质培养中的系统性作用与长远价值,避免急功近利的认知与心态阻断自身未来发展的上限。同时强化对学生的数字伦理与道德教育,帮助学生明确是非底线,认识到互联网并非越轨的实践场,认清代课行为的欺骗本质,指引其通过自我反思避免持续偏离正确的认知方向。

参考文献:

- [1] 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M].秘舒,凌旻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 [2] 庄伟,阳荣威.高等教育服务视角下大学生逃课行为分析[J].江苏高教,2008(6):98100.
- [3] 周琦.目标与手段的背离——大学生“隐性逃课”的社会学分析[J].当代青年研究,2001(3):1617,15.
- [4] 郑新夷,管晶晶.大学生逃课行为和g心理控制点的归因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8(9):990993.
- [5] 邵郁,张伟娟.大学生何以沉默:数智时代课堂生态联结的断裂与重构[J].重庆高教研究,2025,13(5):8695.
- [6] 马成俊,刘平剑.课堂隐退:大学逃课现象的生成机制与理性审视[J].重庆高教研究,2025,13(3):117127.
- [7] 孙凯奇.智媒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真实性在场”的隐退与复归——从高校思政课“隐性逃课”谈起[J].江苏高教,2023,(3):9399.
- [8] 陈学金.如何做民族志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23:32.
- [9] 大卫·M.费特曼.民族志:步步深入[M].龚建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
- [10] 程猛,陈娴.“循规者”的文化生产[J].青年研究,2016(2):5867,9596.
- [11] 程猛,康永久.“底层文化资本”的第二次诞生[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5,46(3):5868,87.
- [12] Griffin C.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likely lads? “Learning to Labor”25 years on[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2005,26(2):294297.
- [13] 康永久,程猛.洞察、文化生产与循规——对威利斯《学做工》的再审视[J].教育研究与实验,2021(5):411.
- [14] Meyer J W, Rowan B.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7,83(2):340363.
- [15] 保罗·威利斯,朱丽.文化生产: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5,46(4):48.
- [16] 王道俊,郭文安.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16.
- [17] Van Blerkom M L. Class attendance in undergraduate classes: why and when do students miss classes[C]//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Boston,1990:410.
- [18] 卢家楣,徐雷,蔡丹,等.当代大学生道德情感现状调查研究[J].教育研究,2016,37(12):5461.
- [19] 黄四林,韩明跃,张梅.人际关系对责任感的影响[J].心理学报,2016,48(5):578587.
- [20] 牛风蕊,张紫薇.高校教师教学科研偏好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学术职业变革-中国大陆”的问卷调查[J].现代教育管理,2017(8):5358.
- [21] 侯清麟,刘文良.高校教学、科研和谐发展的困惑与超越[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2(6):9495,180.
- [22] 韩丽颖.新生代大学生发展的特征、矛盾与对策[J].社会科学战线,2022(3):215223.
- [23] 桑志坚.学校教育时间的社会逻辑[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154182.
- [24] 石艳.我们的“异托邦”:学校空间社会学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04313.
- [25] 涂尔干.道德教育[M].陈光金,沈杰,朱谐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23.
- [26] 翟进.从失范到紧张:青少年越轨行为研究的衍变及本土化视角[J].社会科学研究,2012(3):115119.
- [27] 石中英.师道尊严的历史本意与时代意义[J].当代教师教育,2017,10(2):1823.
- [28] 张东娇.师生关系新走向:双向式“师道尊严”[J].教育科学,2007(1):6063.
- [29] WILLS P. Being modern in China: a western cultural analysis of modernity, tradition and schooling in China toda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20:233.
- [30] 鲍威,何元皓,张高飞.自主探索的时间贫困:高校学生时间配置及其结构性制约机制[J].教育研究,2024,45(12):124139.

- [31] 吕榭,陈武元. 社会加速视域下大学生学习异化风险的现实表征、生成逻辑及应对[J]. 现代大学教育,2024,40(5):104-109,112.
- [32] 丁云华,沈红. 内在驱动还是外部驱使? 高校教师科研产出及其影响机制分析[J]. 复旦教育论坛,2022,20(1):7885.
- [33] 别敦荣. 论学分制的教育原理及实施的原则要求[J]. 中国高教研究,2013,(3):615.
- [34] 詹姆斯·C. 斯科特. 弱者的武器[M]. 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 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7:35.
- [35] 青听:最想离开的那次,关门声音最小[EB/OL]. (2017421)[20250917].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E5MzQzMA==&mid=2654968050&idx=1&sn=78e3d67a461327c7cf21321e79c3c52b&chksm=84bf75cbb3c8fcdde1f6581c4176f9caa4a82e59ebe05fb99867f0a0f6d7e08977ff0d7d32f5&scene=27.
- [36] 康德. 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M]. 沈书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64.
- [37] 格特·比斯塔. 教育的美丽风险[M]. 赵康,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718.

(责任编辑:刘大川 蔡宗模 校对:蔡宗模)

Conformist Lads: A Study on the Behavioral Logic of Undergraduates’ “Substitute Attendance” Phenomenon

Feng Lifan^{1,2}, Zhang Yue¹

(1. Faculty of Educatio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2.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Qinghai Minzu University, Xining 810007,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 new form of truancy—“hiring class substitutes”—has emerged in universities. This phenomenon refers to undergraduates achieving both physical and mental absence from class through having a substitute present. It is distinct from traditional explicit or implicit truancy, and thus is defined as a “third type of truancy”. However, existing studies primarily focus on traditional truancy types and lack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hiring class substitutes”. Based on field surveys, this study found that undergraduates engaging in hiring class substitutes exhibit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wo groups. On the one hand, they resemble “the lads who resist the school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they choose to maintain the appearance of compliance when confronting school systems and authority, thereby shaping the role of “conformist lads” featuring “symbolic conform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havioral logic, social changes and cognitive conflicts have weakened students’ perception of classroom value, while the alienation of teacher–studen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has undermined the external constraints on students’ moral behaviors. Coupled with the phased characteristics of undergraduate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which have driven their pursuit of autonomy, three types of driving forces—instrumental, alienated, and self-determining—have collectively emerged. This is the main reason why college students exhibit deviant behaviors as “the lads”. Meanwhile, the pressure of attendance assessment, deficiencies in management systems, the empower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dividuals’ cognitive biases have enabled university students to maintain a form of “symbolic compliance” through “hiring substitutes for class”. To address such a phenomenon, on the basis of remedying the deficiencies in management systems,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explore ways to reshape the unique value of classroom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learning communities, and enhance academic planning guidance for students, so as to guide them to establish correct perceptions.

Key words: undergraduates; class-skipping; substitute attendance; symbolic conformity; higher education; educational management